

兩岸國人思維方式與中華文化認同比較

姜佟琳

(北京大學 碩士生)

摘要:利用內隱聯想測驗,本文發現臺灣被試對中華文化符號與積極詞聯繫在一起的反應時顯著小於對中華文化符號與消極詞聯繫在一起的反應時。而在中華文化符號與積極詞聯繫的反應中,大陸被試和臺灣被試的反應時並不存在顯著差異。此外,在思維方式研究中,在臺灣被試中,本文得到了與大陸被試相似的思維結構。

關鍵字:大陸 臺灣 思維結構 中華文化認同

關於大陸和臺灣的關係、異同比較一直是學界探討的熱點。早前就有學者指出,同文同種的大陸和臺灣雖然有著同樣的華人文化傳統,但卻因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社會走向,歷史變遷的不同表現出明顯的社會文化差異(陸洛,2008)。但是,在心理學研究領域,對於兩岸比較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組織行為學上,且研究結果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並沒有觸及到兩岸國人差異表現的深層心理原因。因此,本研究旨在從文化心理學的視角,對兩岸國人差異表現的心理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1、兩岸國人中華文化認同之比較

楊國樞在對中國人的傳統性和現代性系統研究之時,建構了文化生態互動論的解釋框架,他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民眾的心理與行為都會受到該社會生態環境、經濟特徵、社會形態及社會生活方式所影響。從文化生態互動論的角度看,人與文化生態處於互動的關係之中,心理與行為的改變在內涵與強度方面都不能脫離這種互動關係(楊宜音,2002)。因此,他提出傳統性和現代性這一維度來解釋現代社會中中國人的心理。

在認同上,就台灣而說,就有“文化中國,政治中國”、“文化中國,政治台灣”、“文化台灣,政治台灣”三種不同認知。(李美枝,2003)。撇去政治上的討論不談,文化認同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相較於大陸,台灣有著複雜的社會文化背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探索更為自覺。在有人拋出“文化台灣”的論點時,也有人堅持台灣比大陸更好地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以此問題為導向,我們認為研究對兩岸國人文化認同之比較不僅能夠填補兩岸比較研究之空白,而且更能夠對一些爭議問題作出科學上的澄清。

1.1 研究方法

內隱聯想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簡稱IAT)是Greenwald 等人(1998)提出的一種通過測量概念詞和屬性詞之間評價性聯繫從而對個體的內隱

態度等內隱社會認知進行間接測量的新方法。

所謂相容，指概念詞和屬性詞的聯繫與被試內隱的態度一致，或對被試而言有著緊密且合理的聯繫，否則為不相容或相反。當對相容關係進行反應時，實驗刺激與被試內隱態度一致，此時的語詞歸類問題在時間壓力下轉化為自動化加工，相對容易，因而反應速度快，反應時短；當呈現不相容的條件時，實驗刺激與被試的內隱態度不一致，引發被試的認知衝突，此時的反應任務需要有意義的複雜加工，因而反應時會加長；不相容條件下的與相容條件下的反應時之差即為內隱態度的指標。

在本研究中，選取中國文化符號（故宮、漢語）和西方文化符號（矽谷、英語）作為概念詞，選取積極詞（燦爛、包容）和消極詞（殘忍、痛苦）作為屬性詞。我們假設，不論是大陸還是台灣，中國文化符號和積極詞聯繫出現為相容組，反應時較快。中國文化符號和消極詞聯繫出現為不相容組，反應時較慢。

1.2 研究結果

在台灣和大陸，我們各抽取了20名被試進行被試內的內隱聯想測驗，其測驗結果如下：

大陸研究結果如下：

大陸共有20人參加實驗，男8人，女12人。年齡在 24.55 ± 1.234 範圍內波動。通過配對樣本檢驗，我們發現不相容組的反應時（940.596ms）顯著高於相容組的反應時（789.707ms）， $t=3.48^{**}$ 。不相容組的正確數（26.250）顯著低於相容組的正確數（27.150）， $t=-2.32^{*}$ 。研究結果說明大陸被試更傾向於將中華文化符號與積極詞彙聯繫在一起，對中華文化有積極的認知。

台灣研究結果如下：

同大陸研究一樣，臺灣共有20人參加實驗，男11人，女9人。年齡在 25.8 ± 3.19 範圍內波動。通過配對樣本t檢驗，我們發現在臺灣被試中，不相容組反應時（1192.988ms）顯著高於相容組反應時（880.141ms）， $t=6.914^{***}$ ，達到了極其顯著的水準。而在正確數上，不相容組的正確數（26.15）顯著低於相容組的正確數（27.50）， $t=-3.327^{**}$ ，同樣也達到了顯著的水準。結果說明，同大陸被試一樣，臺灣被試也傾向於將中國文化符號同積極語詞聯繫在一起，中華文化有積極的認知，進而，我們可以推論，臺灣對中華文化有較好的認同。

進一步，我們對大陸和臺灣被試認同差異進行研究，利用統計方法，控制住兩組被試反應的基線值，我們對兩組被試在相容組反應時上進行統計檢驗。

台灣與大陸比較研究結果如下：

控制住基線水準，在相容條件下，大陸組反應時為12.763ms，臺灣組反應時為-73.613（正值意味著反應慢于基線水準，負值意味著反應快于基線水準）。臺

灣被試對於相容條件的反應快於大陸，但是並沒有達到顯著性水準($t=1.519$ $p=.137$)。也就是說在對中華文化符號與積極詞聯繫的反應上，大陸和臺灣被試並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2、兩岸國人之比較研究

思維方式是人們用以處理資訊和感知周圍世界的一種思維習慣，是一種較為固定的元認知模式（侯玉波，2007）。

思維方式反應了一個人看待和思考問題時的一種基本傾向，它不僅反映了個體處理問題時的方式，而且也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因此，本文認為對兩岸國人思維方式的比較有利於我們理解大陸與臺灣的異同以及兩者的關係走向。

而通過對中國文化的深入分析和中西思維方式的對比，侯玉波等人（2001，2004）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編制出中國人整體思維方式量表，得出了5個維度，即聯繫性、變化性、矛盾性、折中性與和諧性。後經過反復驗證聚合，將5因素進一步聚合，得出含有三個維度的中國人整體思維方式量表。這3個維度分別是聯繫性、變化性和矛盾性。

作為一種元認知特性，思維方式在影響著人們感知資訊，處理問題傾向的同時，又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Peng & Nisbett 1999）。鑒於研究1得出兩岸國人都認同中華文化，在本研究中，我們假設根植于中華文化土壤中的思維方式，具體表現在兩岸國人思維方式上也不存在質的差異。

2.1、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因為兩岸國人都認同中華文化，而思維方式也是根植于文化的土壤中，因此，我們認為以大陸被試為樣本編制出的中國人整體思維方式量表對於台灣被試有同樣的適用性。對台灣160名被試做了問卷調查，並藉助統計分析方法，進行降維處理，將抽取出的因數與大陸被試抽取出的因數做比較。在160名被試中，男85人，女75人。年齡在 23 ± 4.544 間波動。

對160個被試得出的數據進行因素分析，選取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共抽取出6個因素。累計解釋方差數為69.925%，解釋效果理想。這六個因素對應的題目以及對應的大陸研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1. 兩岸國人思維方式之比較研究結果

台灣研究結果		大陸研究結果	
因素	題目	因素	題目
A	2、3、5	聯繫性	2、3、5
B	4、6、7、1	變化性	1、4、6、7

C	9、12、13	矛盾性	9、12、13、15
D	10、11	折中性	10、11、17
E	15、17、16	和諧性	15、17、16
F	8、14		

從上表可以看出，兩岸國人在思維方式的結構還是基本一致的，前三個因素聯繫性、變化性和矛盾性、基本吻合，出入存在與後免得折中性和和諧性兩個維度上。

3、討論

通過內隱聯想測驗，我們得出臺灣被試對中華文化和積極辭彙的聯繫有顯著較快的反應。這說明儘管有著複雜多元的文化背景，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積極認同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在與大陸被試的比較中，我們發現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符號的積極反應要快於大陸民眾，但這種優勢並沒有達到顯著，也就是說兩岸民眾在對中華文化的積極認同上並不存在顯著差異，而這為兩岸溝通交流、對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思維方式的研究中，在臺灣被試中，我們抽取出6個因素，雖然和大陸5因素、3因素的結構有些出入，但是在具體條目劃分上，與大陸的5因素思維結構還是能夠契合的。

學者侯玉波（2013）曾指出，在大陸的思維方式研究中，2001年對437名大陸被試得出了聯繫性、變化性、矛盾性、折中性與和諧型5個因素，從對樣本的分析來看，用5個因素衡量中國人的思維結構是適當的。但是因為思維方式的複雜性和抽象性，在確定它的結構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幾個重要的問題：

一是樣本的代表性和涵蓋範圍問題：預實驗的樣本涵蓋範圍較窄，其中主要以學生為主，18—22歲的大學生占到了90%，這樣的被試構成很難全面的反映中國人整體的思維特性，所以在正式研究中必須擴大樣本的涵蓋範圍。從常模確立的角度看，要想得到中國人思維方式特性的常模，也必須有足夠數量的樣本。

二是結構的合理性問題：預實驗的結果從因素的選取上講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於因素選取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的人為性，所以在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抽取因素的時候，還需要考慮其他的問題，如題目的內部一致性問題。在大陸的樣本中，選取的這17個題目分佈在5個因素之上，每個因素包括3—4個題目，僅僅滿足設定因素的最低條件，很難得到理想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所以初步確定的結構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2004年，考慮上述這些因素，為了更好的衡量中國人的思維結構，侯玉波（2013）又收集了2400多人的資料，用於建構中國人思維方式量表。並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確立中國人思維特性的結構和常模。通過分析和進一步的聚合，最

終得到三因素的思維方式量表，這三個因素分別為聯繫性、變化性和矛盾性。

在這裏，同樣的問題也存在與台灣的有關研究中，被試量少且代表性使得我們只能夠對樣本進行初步分析，將樣本所得的結果與最初 5 因素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為了能更清楚兩岸國人思維方式結構上、量上的異同，擴大樣本範圍和樣本容量是接下來進一步研究需要突破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 趙志裕。(2000). 中庸思維的測量：一項跨地區研究的初步結果.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18, 22-54.
- 楊宜音。(2002). 社會變遷與人的變遷楊國樞等人關於個人現代性研究述評. 見 葉啟政(編), 本土心理研究叢書 5——從現代到本土, 19-39. 臺北：臺北遠流圖書公司.
- 黃光國。(2006). 儒家社會中的面子：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見 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進展會議論文集, 6, 1-52.
- 侯玉波。(2007). 社會心理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侯玉波。(2007). 文化心理學視野中的思維方式. 心理科學進展, 15(2), 211-216.
- 高旭繁, 陸洛, 陸昌勤。(2008). 工作與家庭的要求和資源、工作-家庭衝突及其後果 ——臺灣與大陸的比較. 中國經濟評論, 9, (82), 39-47.
- 楊國樞&陸洛。(2009). 中國人的自我.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趙志裕&康螢儀。(2010). 文化社會心理學.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黃金蘭, 林以正&楊中芳。(2012). 中庸信念-價值量表之修訂. 本土心理學研究, 38, 3-41.
- Triandis, Harry C. (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2), 323-338.
- Sternberg R. J. (1997). Thinking sty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g, K. P., & Richard E. Nisbett. (1999).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Science Watch*, 54(9), 741-754.
- Hou, Yubo and Zhu Ying, (2002). The Chinese holistic thinking styles: Their structure and effect. *APA Annual Symposium*. Chicago, August 22-25.
- Hou, Y. B and Y. Zhu, (2002).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thinking style of Chinese people. *Psychologica Sinica* 34, 106-111.

- Luo Lu, Cary L. Cooper, Shu-Fang Kao, Yun Zhou, (2003). Work stress, control beliefs and well-being in Greater China: An exploration of sub-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C and Taiwa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18(6)*, 479-510.
- Hou, Y.B., Zhu, Y, & Peng, K.P. (2003). Thinking styles and disease cognitions among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4*, 161-180.
- Lu, L., & Yang, K. S. (2006).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 167-175.
- Sui, J., Zhu, Y., Chiu, C.Y. (2007). Bicultural mind, self-construal, and self- and mother-reference effects: Consequences of cultural priming on recognition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5)*, 818 - 824.
- Lu, L., Kao, S.F., Chang, T.T., Wu, H.P., Jin, Z. (200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oriented Chinese bicultural self: a subcultural analysis contrasting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6 (3)*, 337-346.
- Hou, Y.B., Gao, G., Wang, F., Li, T.R., & Yu Z.L. (2011).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effect of thinking styles.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2(2)*.
- Jiang, F., Lu, S., Hou Y.B., & Yue. X.D. (2012).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health behaviors: The effects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
- Hou, Y.B. (2013). Chinese Holistic Thinking Styles: Their Concept and Structure. (*in press*).